

日本研究丛书

# 日本历史与 文化研究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

徐静波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丛 书 序

在冷战结束、世界新格局逐渐形成的今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进入到关键阶段。在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前,审时度势,拓展思维空间,立足国情,博采众长,是使我国在不远的未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目前,世界范围内区域性冲突加剧的同时,区域性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日本同处东亚,互为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对各自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战后日本崛起于亚洲和世界,成功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现代化,更给我们留下了思考 and 研究的广阔空间。基于此,我校经数年筹策,于1990年正式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借鉴;另外,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的全面研究,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深化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扩大双边多领域的合作。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希望这套凝聚着中外学者智慧结晶的丛书,能够成为我国和国际日本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于《日本研究丛书》首本付梓之际,对给予我们这项工作以热情支持、帮助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以及中外有关朋友,谨表示诚挚的谢忱。

是为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郑励志

1991年11月

# 编者前言

成立于1990年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中已经走过了跨越世纪的历程,今年迎来了成立20周年的纪念年。为了检阅这20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编辑了这套三卷本的研究文集,我受命负责编选文化卷。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一个常设的研究机构,但它称为研究中心而不是研究所,其特点就在于它除了拥有自己专职的研究人员之外,还通过兼职研究员的机制来协调和整合复旦大学内的日本研究资源,使其达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发挥。因此,本纪念文集也是专职研究员和兼职研究员共同努力的结晶。

文化目前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科目,它的范围也可谓包罗万象,但大致应该在人文科学的范畴,也就是传统的文史哲。本着这样的理念,本论文集的编选大致基于如下的原则。

第一,所选的论文可以是以前发表过的,也可以是新近撰写的,但写作时间在日本研究中心成立的1990年至2010年这20年间,事实上,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虽说是对20年来的研究业绩的一次检阅,但实际上反映了近几年的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动态。文章的排列顺序,分成两大部分,已发表过的论文,按发表的日期先后排列,新近撰写的则排在最后。

第二,作者均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员或兼职研究员,绝大部分都是现职的复旦大学教授,有少数几位在其他大学供职,但都出身于复旦大学,且始终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

第三,文化研究目前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科目,它的范围

也可谓包罗万象,但大致应该在人文科学的范畴,基本上可归入传统的文史哲领域。本着这样的认识,遴选了17篇论文,有少数作者选录了两篇,并大致分为“历史与文化”和“文学”两个部分。这些划分都是相对而粗略的。

第四,本论文集主题是日本研究,当然以日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中国学者的日本研究,一般会有中国人的立场和视野,往往会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与其连接起来,或者从中国透视日本,或者自日本反观中国。因此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未必完全是纯粹的日本研究,但一定与日本有密切的关联。

以下,对选录的17篇论文的内容及其作者,按照目录的顺序做一个粗略的介绍。

《战后日本的近代人精神类型论》的作者张翔(敬称、职称略,下同),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在广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以后一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在此期间曾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游学,长期以来一直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对丸山真男一脉的学术思想尤其具有精到的心得。《战后日本的近代人精神类型论》一文,以日本经济史家大冢久雄的著作《近代化的人的基础》(『近代化の人間の基礎』)为对象,对战后日本人在重建精神思想方面的努力进行了探讨,对于我们了解今天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颇有裨益。

《白村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的作者韩昇,曾长期在日本留学,并曾在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多所研究机构任职,主攻中国隋唐史和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尤其是中日关系史。他的这篇论文以及所收的另一篇论文《〈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论述的范围基本上都是唐与日本的关系,文献考究细密,立论中肯,前者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后者在中日两国的学术界都曾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对隋唐时期中日关系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供启示处相当不少。

《刍论中日文化中紫色之异同》的作者周保雄，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一直在大学中从事日语教学和日本宗教史的研究，也曾在日本的大学任教。这篇论文以紫色为论题，通过比较中日两国文化对紫色认识的异同，来揭示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特征。论文指出紫色在中国文化中是由植根于宇宙论的色彩观逐渐走向对其物理性质的重视，而在日本文化中，日本人并没有接受孔子“恶紫夺朱”的观念，而是在把紫色推崇到最高位的同时，显现出了本民族强烈的自我意识，开始由全面汉化向日本化转变和发展。这些论述读来令人饶有兴趣，透出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也可供学术界进一步讨论。

《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的作者陈正宏，主要从事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甚丰，曾在关西大学和庆应大学游学，对于流入日本的汉籍以及日本印行的各种汉籍版本，兴趣尤为浓厚，本文即是这方面考订的一个范本，绵密细致，可以看出作者的深厚功力，得出的结论却是在中日两国的艺术史和印刷史上都具有相当的意义。

《汉学、汉译西籍对日本兰学的影响》的作者赵坚，出身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文学博士，在日本的大学任教十余年，具有深湛的学术底蕴，近年来尤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颇有建树。本文不仅翔实地论述了汉学西籍对日本兰学的影响，并对西学在日本的传播和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发人深省处当有不少。

《郑孝胥日记中的东瀛外交生涯》的作者李振声，曾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在日本信州大学任教多年，眼光锐利而沉着，已有十余种著译问世。本文虽横跨历史与文学两大领域，却显现出非同寻常的学术功力。

《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的作者胡令远，从本科至博士，都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现在主要从事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的资深研究人员。本文的副标题是“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由此可知作者试图从精神思想，尤其是价值观和审美意识的视点来探索战后的中日关系，视角独特，内蕴深厚，不是一般的时事评论。

《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自我和外界的新认识》的作者徐静波，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涉猎的领域颇为庞杂，现在主要从事中日文化关系史、中日文化比较研究。该论文认为“日本人意识”的觉醒以及西洋先进的观念，是在江户中期即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并日益凸显出来的。作者认为形成这一认识或意识，自然有诸多缘由，但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洋人的到来以及从西洋输入的新知识，尤其是描述整个世界的相关地理知识，无疑是酿成日本人对外界和自身新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它与明治时期形成的“脱亚入欧”的社会思潮也有相当的内在关联。该作者的另一篇论文《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研究》被收录在本文集的下编，其实这篇论文论述的对象虽然是日本作家，讨论的却并不是文学问题，但后来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选刊的《外国文学》转载，这里也就列在了文学部分。

《“日本无条件投降”辨析》的作者冯玮，历史系出身，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专攻日本历史，曾在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游学多年，成果丰硕，迄今已出版有包括《日本史》在内的著译十余种。该论文按照历史的实际脉络廓清了“日本无条件投降”认识中的某些误区，辨析有力。收入本文集中的另一篇论文《试论日本同性恋的缘起及其在僧侣和武士中的流行》是作者正在着力进行的日本性文化课题研究的首篇作品，独辟蹊径，可以说是一篇填补空白性质的力作，我们期待着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的圆满完成。

《日本的古典园林与西湖》的作者许金生，原先主攻日本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已有相关的著作问世，后来涉猎园林文化，又有佳作付梓。这篇论文如标题所示，主要论述作为一个文化存

在的西湖对日本造园的影响,也是属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一部分,读来令人产生浓厚的兴趣。

《当荒诞变成了日常》的作者施小炜,是“文革”后复旦大学外文系首批毕业生之一,后去早稻田大学攻读日本近代文学的博士课程,是芥川龙之介的研究家之一,也是村上春树三卷本的《1Q84》(南海出版社)的译者。这篇论文是一篇论述争议颇多的名作家——太宰治的苦心之作,大概也是本论文集所收录的篇幅最为浩大的一篇论文,是作者长久以来的研究心得的出色表述。

《存在主义文学在日本》和《战后日本的超现实主义文学》两篇论文的作者邹波,是本论文集所有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虽然他也不能说是初出茅庐的后生。他从本科起一直到博士课程阶段,一直潜心研究安部公房和战后日本文学,是一位基础十分扎实的研究者。这两篇论文显示了中国新一代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实力和建立在实力之上的应有的话语权,值得仔细研读。

本论文集中所收录的论文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注明了作者的供职单位和职称。已发表的论文,均注明了发表的期刊名和日期,内容原则上一仍其旧,只有少数文章经作者作了技术上的修改;未注明发表期刊的,均为首次刊行。

最后,谨对惠赐大稿的各位作者以及编辑出版本纪念文集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致以衷心的感谢。在编选上若有不妥之处,责任在于编者,尚祈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

徐静波

2010年5月31日于六甲山麓的神户大学

# 目 录

## 上编 历史与文化

战后日本的近代人精神类型论

——以大冢久雄的《近代化的人的基础》为中心 / 张翔 3

白村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 / 韩昇 25

刍论中日文化中紫色之异同 / 周保雄 65

京都所得《芥舟学画编》套印书版零片考 / 陈正宏 78

汉学、汉译西籍对日本兰学的影响 / 赵坚 93

郑孝胥日记中的东瀛外交生涯 / 李振声 117

文化交流、价值向度与历史认识

——简论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要素 / 胡令远 144

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自我和外界的新认识 / 徐静波 159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 / 韩昇 174

“日本无条件投降”辨析

——对一种“错误常识”的匡正 / 冯玮 194

试论日本同性恋的缘起及其在僧侣和武士中的流行 / 冯玮 218

日本的古典园林与西湖 / 许金生 233

## 下编 文 学

村松梢风的中国游历和中国观研究

——兼论同时期日本文人的中国观 / 徐静波 245

中国当代文学阅读视野中的日本现当代小说 / 李振声 265

当荒诞变成了日常

——论太宰治《等待》，以其文学的“普遍性”为视角 / 施小炜 279

存在主义文学在日本

——以安部公房的创作为中心 / 邹波 303

战后日本的超现实主义文学

——以安部公房的创作为中心 / 邹波 341

上编

历史与文化

# 战后日本的近代人精神类型论

——以大冢久雄的《近代化的人的基础》为中心<sup>①</sup>

张 翔

## 序 论

本文所包含的时期大体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直接占领日本全国，并实施战后统治和改革开始的。日本战后时期的确切定义和时代划分在学术界尚存在争议，这里权且限定于二次大战后的初期阶段<sup>②</sup>。战后日本面临着诸多困难，这不仅因为这个时期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期，尤其也是一个精神的匮乏时期。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物质匮乏的时期（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是，由于这主要取决于当事者的感觉，人类依然可以生活得非常充足和自得。但是，二战以后的日本，虽然物质极度匮乏，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败，“万世一系，八紘一宇”的天皇至上主义的体

---

① 日文原文是“近代化の人間の基礎”。所谓“人间”，按照日本权威的辞典『广辞苑』，第一义为“人の住む所。世の中。世間。じんかん”；第二义为“（社会的存在として人格を中心に考えた）ひと、また、その全体”。从全文来看，显然大家此处的“人间”用的是第二义。但是中文的“人间”则仅仅是第一义，即“人世，世间”（参见《辞源》“人间”条）之义，而无日语中的第二义。

② 战后当然从日本战败开始，但是关于日本的战后何时终结却引起许多讨论，以至于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称“战后某某年”。参见鹤见俊辅等『戦後とは何か』（青弓社1985年版）、渡边昭夫编『戦後日本の形成』（日本学术振兴会、丸善書店1996年版）等。

制和意识形态也随之垮台,它所带来更多的是精神的匮乏和虚脱。

显然,在这个伴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大改革的时期,日本战后初期的进步学者都义不容辞地、积极地参加了这场改革运动。而且,与其说他们关注物质生产发展或体制的改革,不如说更为关注精神现状的改革。战后初期的东京大学总长(即校长)南原繁的话也许反映了当时日本学界和知识人的共同的忧虑:“祖国目前处于何种政治的、经济的苦难之中,我们都非常明白。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引起这些政治的、经济的苦难的东西盘踞于国民的知识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精神生活的根底。因此,只要没有对于这种国民精神的彻底的自我批判和变革,那么,无论何种政治的、社会的变革都会归于失败的。”<sup>①</sup>与此同时,那些学者在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的同时,也超越了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战后日本人的精神改革和重建的事业。其中,西欧经济史的大冢久雄(1907—1996)、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丸山真男(1914—1996)、法社会学的川岛武宜(1909—1992)可以说是战后初期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代表人物<sup>②</sup>。

本文试就日本的西方经济史家大冢久雄在《近代化的人的基础》一书中所提及的近代人的类型论(根据大冢该书的主题脉络,为了理解的方便,本文改译为“近代人的精神类型论”)做一个初步的探讨,而非全面的分析,故难免挂一漏万。此外,此书严格意义上说是一本论文集,是由作者在各个时期所发表的文章汇集而成<sup>③</sup>,全面的分析需要对作者庞大的著作群进行细致的、深入的探

---

① 南原繁《人間革命》、东京大学新闻出版部1948年版、序文。转引自松本三之介《日本の近代化と戦後思想》、増田四郎、堀米庸三编《新しい歴史像》(「講座 日本の将来」第8卷)、潮出版社1969年版、172頁。

② 藤田省三《社会科学者の思想》、久野收、鹤见俊辅、藤田省三编《戦後日本の思想》、劲草書房1966年版、150頁;另参见石田雄《敗戦後における社会科学の蘇生》、载同著《日本の社会科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

③ 该书各篇文章的目录罗列译出如次:序,近代人的类型的创出——政治主体的民众基础的问题,自由与独立,自由主义的前提,近代的自由和自由主义,罗宾逊·克鲁索的人的类型,从魔术中解放,生产力与人的类型——近代资本主义发达史的基础论点。

讨,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这些只能留待他日。该书初版由白日书店于1948年出版,此后由筑摩书店于1968年将其作为同名著作的第一部分,并且增加了若干相关主题的论文重新出版。本文主要针对他1948年出版的同名的著作进行一些简单评述,而所依据的版本则是《大冢久雄著作集》第8卷(岩波书店1969年版)。

大冢久雄生于1907年,1927年进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30年毕业后任职其他大学,1939年回东京帝大经济学部任教。主要出版了《株式会社发生史论》(1938)、《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1944)、《近代资本主义的系谱》(1947)、《共同体的基础理论》(1955)、《社会科学的方法——韦伯与马克思》(1966),主编了《欧洲经济史讲座》(5卷,1960、1962)等学术著作,在从事本专业的近代西方经济史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对国民经济体制、共同体的理论、经济和宗教·伦理、社会科学方法论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大冢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并在经济史学界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大冢史学派”<sup>①</sup>。此外,他参与重译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55年以后),并且主持、组织了日本全国性的“马克斯·韦伯诞生百年学术讨论会”(1964)。青年时期的大冢在大学求学期间,参加了内村鉴三、矢内原忠雄(二次大战后初期曾任东京大学总长)等组织的无教会主义派的《圣经》读书会,这被认为对他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②</sup>。

就“人的精神类型”而言,显然,大冢的“人的精神类型”的概念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英文:ideal type,德文:ideal typ,日语:理念型)有很大的亲缘关系。韦伯曾经对“理想类型”作过以下的阐述:

---

① 内田芳明「ヴェーバーとマルクス:日本社会科学の思想構造」,岩波書店1972年版,310頁。

② 参見内田前著第8章、及其论文「大塚久雄——その経済学及びヴェーバー・マルクスの意味」,『现代思想』杂志、青土社1975年第1期。

一种理想类型是通过片面突出一个或更多的观点,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和偶尔又不存在的个别现象而形成的,这些现象根据那些被片面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到统一的分析结构中。就概念的纯洁性而言,在现实世界的任何地方中都不能凭借经验找到这种精神结构。它是一种乌托邦。历史研究所面临着任务是,在每一个别实例中,确定这种理想结构的接近或脱离现实的程度……<sup>①</sup>

也就是说:所谓“理想类型”并不是一种经验的实在,而是为了解释、解释现实而建立的一种思维的设定或假设,或者说是一种工具,用于对比各种现实中的人类的精神或实践以及社会组织等各种状态与纯粹状态·标准之间的距离和差异。大冢在该书“序”的部分,也对此作了一些说明,“本书所谓的人的精神类型或伦理……可以宽泛地予以说明。即具体的人对于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环境和刺激等各自作出反应,这些反应的方法有各种差异。比喻地说,就是会发现可被称为社会本质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精神类型,就是伦理”<sup>②</sup>。然后,他继续说明“人的精神类型是非常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它不是单个人的性格,或是这些性格的个人差,而应该作为历史的、社会的精神类型予以把握”<sup>③</sup>。在该书的第一篇论文中,他写道“盘踞着人的精神类型这个问题的深层或者核心的就是 ethos(人的伦理精神类型)的问题”<sup>④</sup>,因此,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包含伦理、价值意识等的人的精神类型。

---

<sup>①</sup> 〔德〕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福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sup>②</sup> 『大塚久雄著作集』第8卷、岩波書店1969年版、163頁。(以下简称《著作集》某卷某页。)

<sup>③</sup> 《著作集》第8卷,第164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173页。

就“近代人”<sup>①</sup>这一用语而言,其含义并非仅仅指时间意义上进入近代时期的人,而是指区别于“传统人”(当然在中国或日本,这并不是一个常见的词)精神类型的一种精神类型,显然这是一个带有正面肯定的价值评判的概念,换一种说法或许可以说就是“近代化的人”。关于日本的“近代化”一词,按照大冢本人的说法,是由他本人从战后初期最初开始使用<sup>②</sup>,而本文按照原文使用的“近代化”,在日语中其含义大体相当于 modernization,因此与中文所说的“现代化”的概念应该是相同或近似的。其本义即指自 16 世纪西欧开始形成,并逐渐扩展到全球的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变革运动,当然,各个文化区域或国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方法、途径、动力及其特点<sup>③</sup>。就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而言,正如美国学者 A·英克尔斯所指出“现代化研究的第一种分析思路把重点置于强调社会组织的模式,而第二种思路则更强调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模式。前一种方法更重视组织和行动的方式,后一种方法却认为思想和情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一种方法更关注机构,另一种方法更关注个人”<sup>④</sup>。总结起来,大冢的研究业绩主要集中在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近代人的伦理精神这两方面课题,而

① 关于“近代”和“近代化”,大冢在《著作集》第 8 卷的“后记”中做了更明确的追述,他写道:“所谓近代的或近代化,一般被看作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化相同的意思,但是在我看来……虽然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作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还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即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各种形态中的一个不仅向资本主义,也包含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同书第 616 页。显然他的“近代”和“近代化”概念是一个走出传统社会进入更高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限于篇幅,容后日探讨。

② 大冢曾就此写道“‘近代化’这个词,是在战争结束后初期开始频繁使用(如果仅仅是‘近代’或‘近代的’,则是很早就出现了)。”《著作集》第 8 卷“后记”,同书第 616 页。

③ 参见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1997 年版;谢立中、孙立平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但是,另外一些学者,譬如贡德·弗兰克、滨下武志等学者则对“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概念及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④ “近代人的模型:理论和方法问题”,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68 页。

大家该书所涉及的问题则属于后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或者至少是社会的中坚群体，这在以下的行文中读者自可予以了解。

## 一、关于伦理与近代人的品质

对于二战结束后初期的日本的改革，日本著名学者松本三之介曾经做过一个精辟的论述。

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并非通过民众的自觉和自主运动的高涨，而是利用了占领军的权威和权力作为杠杆而被引进，并通过对权威忠顺的民众的传统性态度而被普及。这对以单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判断为本质要素的民主主义而言，这本身意味着一种自我矛盾。<sup>①</sup>

在大家那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

在《近代化的人的基础》的第一篇论文“近代人类型的创出——政治主体的民众基础的问题”里，他首先写到“我国经济的再生必须朝着民主的方向推进，是当今不可避免的至上命令。而且，同样也是不容置疑的是：这个经济的民主化的再生，不应该是单纯地由外面的强大压力所强制、形成没有灵魂的民主主义的制度上的形骸，或者说‘死的机构’，而应该是通过从再生日本的内部自主地、自发地推进以形成真正的民主式的东西”。因此，“为了避免民主主义画虎不成反类犬，首先人主体的近代化、民主化，也就

---

<sup>①</sup> 松本三之介「日本の近代化と戦後思想」、増田四郎、堀米庸三編「新しい歴史像」(「講座 日本の将来」第8巻)、潮出版社1969年版、167頁。

是把民众教育成近代的、民主的人的精神类型——当然也包含着它的物质基础的形成——比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sup>①</sup>。

同时，大家对日本社会中存在的非近代、反近代因素也作了剖析和批评。“我认为，我国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人的精神类型，具有很难简单地称之为‘封建式’的复杂性，而可以说是‘亚洲式’的……至少是近代以前的，几乎是无需说明的……在那里看不到近代人特有的内在的自发性。也看不到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平’——不是中世纪的‘公正’——的特性。也看不到作为近代科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理性主义。尤其是看不到作为近代精神的基本特征的对民众的爱和尊敬、对无名的民众的日常经济生活抱着深切关照的社会性的关怀”<sup>②</sup>。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家此书的主要目的。

他依据韦伯的比较宗教学研究观点，认为“近代西欧的伦理与亚洲的伦理进行对比，马克斯·韦伯认为前者具有‘内在品位’伦理的特征，后者具有‘外在品位’伦理的特征。根据他的观点，亚洲的伦理里‘维持体面’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问题。（因而）礼仪、程序成为问题。在此，内在的高度和深度等等不很受到重视，外在的受教育程度（学历——引者注）、地位的高低、礼仪程序的谨严，甚至‘看上去很了不起的服装和态度’等受到很大的关注。而且，在此不存在对根源性的‘恶’的观念。因此，伦理上的‘恶’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审美的东西，变成‘失礼’、‘低贱’、‘肮脏’、‘不成体统’等形式上的东西”<sup>③</sup>。

大家还特别分析了“亲心”（即慈父之心）这个词，“指导者或者身居高位者具有父亲的权威。民众或平头百姓则必须对这个权威表示恭顺。拥有作为父亲权威的领导者，以‘慈祥’面对作为子女的恭顺的民众。而恭顺正是民众的美德，而且他们的幸福正是恭

① 《著作集》第8卷，第170页。

② 同上书，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173—174页。